

中国古代文论的伦理向度

董正宇,肖颖红^①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内容丰富,密切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在文以载道、以理节情和知人论世三个向度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影响和规约着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古代文论; 文以载道; 以理节情; 知人论世; 伦理向度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3-0086-07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换句话说,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文学所面对的宽广博大的人的伦理道德世界,构成了文学的内容和意蕴。换言之,具有审美价值的伦理道德世界为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源泉。文学与伦理虽然并属于社会思想领域,但由于文学展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各个方面,“提供测试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的光谱”^[1],因而文学作品往往有着深刻的伦理内涵。相应地,文论作为文人对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的论述,也往往渲染上了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本文探索中国古代文论多维的伦理向度,对于丰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认知古代士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进而促进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健康有序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文学与伦理联姻的基础:美善统一

文学之美是自然美与社会美在文学中的反映。它以社会美为核心,自然美也被社会化了。文学之美主要是指人的美,包括仪表美、心灵美,人体美和人格美,也就是外在美和内在美。欣赏文学作品,我们无时不刻地体会着作者所表现的美,如从《红楼梦》对王熙凤的描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就体会到她的相貌美和梳妆打扮形成的修饰美。

与此同时,文学又往往以形象的手段通过表现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和纠葛,揭示一定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文学之善同生活之善领域和范围一样广阔,带有全方位和多层次的蕴涵。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公正、自由、博爱、平等等价值观念都是善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作家艺术家也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伪善的揭露和批判,用否定恶的方式和手段,来肯定善的原则,表达自己的道德良心和道德理想。

因此,文学之美和善是一种相互融会、相互契合、相互渗透的关系。早在古代,人们就注意到美和善的统一关系。我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美,“甘也”,“美与善同意”。中国古代文论历来主张“善者言美,恶者言刺”,认为文学应该担负起“载道”的重任。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也可以举出把“美善相提并论”的亚里士多德,提出“寓教于乐”的贺拉斯,以及把美德列为文艺三大主题之一的但丁。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善行和美德,如忧国忧民的思想、集体主义等,有益于社会进步和利他行为,因而也具有审美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献身精神的崇高和悲剧精神,标示出高尚的精神境界,因而也是一种美德。

当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文学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伦理道德在文学中的表达必须符合美的规律^[1]。因此,强调美与善的并重与互动始

[收稿日期] 2012-05-28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文学伦理学与中国文论的渊源研究”资助(编号:2009D50)

[作者简介] 董正宇(1971-),男,湖南衡东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①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终是中外文艺伦理思想发展的主线。

二 中国古代文论伦理向度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哲人、文学家对于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的论述,其主流是创作经验,既包括作家自身的一些创作体会,也包含着对前人作品的品评。从其伦理向度呈现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文学功能: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文学观念的理论化形态的话语体系,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决定了文论带有更多的政治伦理色彩。纵观中国古代文论,随着社会变迁和古代文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不同时期出现了各具特色的文论话语,其中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占主导地位。儒家文论话语体系注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文以载道”是其功利主义性质的集中体现。“文以载道”是伴随儒家文论观形成发展而产生和继承的,其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体现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1、文以载道的先声

诗歌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西周时期,它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诗经》的内容来看,有各地民歌的体现者“风”,也有“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的“雅”,也有祭祖以“美盛德,以其功告于神明”的“颂”^{[2]41}。据此,诗歌充当了国家祭祀的工具,也是礼仪的表现形式。此时,诗歌起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其功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其二是沟通君臣关系。诗歌沟通人神关系的功能从“颂”的内容可以体现出来,它的沟通君臣关系功能则主要从《国风》中反映出来。汉儒的作品《毛诗序》记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正是指出了诗歌的这一功能。这一功能还可以细分为美(臣子对君主肯定性评价)和刺(臣子对君主的批评和规谏,要“主文而谲谏”——婉转地表达对统治者的规谏)。由此可见诗歌的讽喻教化作用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它的政治工具主义性质得到彰显,起到了国家意识形态自我调节机制的作用。

先秦儒家思想正是在西周以诗歌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他提出了诗论中最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兴”是指文学的作用,带有愉悦和陶冶情性之意,“观”是指观风俗之盛衰,“群”含有群居切磋之意,“怨”是指对统

治者失德、失政的地方或者其它不合礼数的地方用诗来讽刺^{[2]16},综合起来说“兴观群怨”是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包括了文学在个人修养及社会功用等方面的价值。

孔子的诗歌阐释理论在其后的孟子和荀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孟子继承了孔子借助文学这种工具实现和谐人与社会关系这一观点,他进一步地转向了改造人的心灵,建构道德自我这一方面。进而,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观点。其中“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批评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知人论世”语出《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2]32}这里他从修身的出发点,提出通过“颂其诗,读其书”的方式来了解古人,与古人交友,并了解古人所处的社会,只有“由其世”(当时的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进而和“文如其人”相沟通,以提高自身修养。这就强调了文品和人品的密切关系。“以意逆志”是通过读古人作品,了解其主题之“意”,从而进一步理解古人之“志”(诗人的思想感情)。孟子提出这两个观点都是表达读诗是为了达到与圣人贤者神交,向前人学习的目的,侧重于追求完美人格(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完美人格),他的观点比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层次更高了。荀子认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他把《诗》、《书》、《礼》、《乐》认为是圣人所言,是道德礼仪之楷模,应作为思想和言行的规范和准则,这一主张开创了“文以载道”的先声。^[3]

2、文以载道的发展:文以明道

西周之后,汉代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理论专论——《毛诗序》,它从政治、道德、风俗等方面对诗歌的作用作了阐述,通过诗歌可以看出时代兴衰,诗歌的教化作用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通过诗教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理想境界。汉儒的代表董仲舒也将文学的功用归结为移风俗,他把道看作教化的必然,而“仁义礼乐”是教化的具体体现,因此,“仁义礼乐”与“道”是相合的。东汉王充则以“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来高度概括文学应有利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南北朝时文学理论家刘勰则指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他认为文章要以道为本原,以圣为师,以经书为宗法标

准^{[2]98}。他还补充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由此他强调了圣人之文与“道”的契合关系,圣人之文重在“陶冶性情”、“修身”等,至此,文以明道说已经形成。

3、文以载道的形成与传承

入唐以来,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有了新发展,在继承儒家文论政治实用性、教化功利性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唐代儒家文论家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阐释古代诗文,实现表达工具主义文论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诗文创作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论观点。这种以建功立业为价值目标,通过“有补时政”的诗文创作,实现文人人生价值,体现了儒家士人新的文论观。白居易崇尚儒家诗教说,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发挥针砭时弊的作用。中唐时期,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政治家极力提倡复兴儒学,使“文”与“道”进一步联系起来,这也促成了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古文运动中,韩愈继承和发扬了“文以载道”的观点,这是他的“明道”思想在“文”方面的贯彻。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些话字里行间浸透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他重其辞,更重其道。这是他对“明道”思想明白无误的表达,又是对当时重辞轻道文风(骈文)的一种批判。韩愈的“文道合一”的观点更是体现其鲜明的儒家思想,由汉朝以来注重外在的事功转向注重内部涵养的建构,强调主观心性的修养,如他所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形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4],把文学当作作家自身内在德性的显现,作家创作是以内在于心性为基础的,体现了对儒家之道的传承与发扬。

宋代儒家文论家欧阳修认为文应“为道”,“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强调文章传道,体现“道”的核心作用。北宋时期以传承儒家之道的理学开始形成,代表人物是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理学文论的开创者周敦颐对“文以载道”做了形象的阐释:“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5],将“文”比喻成“车”,“道”喻为所载之物,体现出文学的道德本位和实用主义倾向。理学家继承韩愈的思想,推崇“文以载道”,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注重对“心性义理”探讨,通过内省式的修养并运用文学创作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理学家邵雍说:“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6]鲜

明地体现理学家不满于诗人仅仅表现个人情感,甚至轻视情感的表达,而追求“天下大义”的心性与理性。在此“文以载道”的“道”由汉朝以来注重外在事功转向注重内部涵养的建构,也即属于‘外王’之道的政治儒学之道向着重于‘内圣’功夫的心性儒学之道转变,继承孔孟的“仁义”之道,是儒道的继承与发展,体现其以文艺维护统治秩序,重塑世道人心,统一思想秩序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的特点。“文以载道”是一种以孔孟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现实功利主义的性质的文论观。

文以载道的传统在宋代之后仍可觅其踪迹,如明代宋濂认为文章应为“正三纲而齐六纪”服务^{[2]197}。清代顾炎武说:“文不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7]清朝章学诚更是提出了“即器以明道”的观点,把六经之类的古籍当做先王经验智慧的总结和概括,都是经世致用之书,他认为“道不离器”,强调“道”应该“持世救偏”,重视载道之器——“文”,反对那些离“道”而专意于辞藻的铺排和对文辞的一味追求^{[2]297}。

“文以载道”这种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切实关注于文艺是否表现中国传统道德价值,是否对改善社会风貌有所裨益,是否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所帮助,体现文学对儒家道德的表现与传承,“文以载道”的主张是儒家功利主义性质文论话语体系的必然诉求。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对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密切关注,体现出现实功利性的特点,并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

(二)文学创作:以理节情

文学创作过程由美感经验的积累、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三个阶段构成。美感经验的累积阶段是作家在社会实践中审美地感知、体验、领悟和评价人及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类精神生活,积累创作素材的阶段;艺术构思阶段是作家依据一定的创作意图,在头脑中酝酿和结构作品的阶段;艺术传达是运用语言符号,将作家头脑中的审美意象以及意象体系外化的阶段。

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属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审美特性决定了文学必须通过形象来表现和认识社会生活,表现寓于事物具体形象之中的美。文学形象是人类运用形象思维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作家的创作过程包含了形象思维的过程,而形象思维过程中,自始至终不脱离形象,不脱离情感。情感在文学创作中起了中介作用。一方面,作家在认识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

作家带着历史的或者现实的社会情感来体验生活,进行形象思维。可见,情感在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中国古代文论中,汤显祖就非常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创作全凭才情的驱使,率意所至,不应当受到束缚,要全靠“心”的“灵动”,“心灵”则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无所不如,只有这样有“灵性”的人才具有“真情”,才可以写出“意、趣、神、色”感天动地的作品来^{[2]222}。清代著名剧作家洪昇也强调戏曲创作中“情”的作用,提出“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长”的戏曲观^{[2]245}。

文学中的理性是作家的思想、意识等心理因素的总称。在文学创作中,理性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方面,理性起到了认识的作用。文学担负着帮助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理解人生的重要任务。为此,作家必须深刻地透视生活,把握它的深层意义与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理性,透过事物的表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理性起到了认识的作用。另一方面,理性在创作中起到了规范作用。具体来说,它的规范性体现为题材的筛选,形象的塑造,结构的安排及语言符号的运用等。举例来说,王安石作诗时非常重视理性思维,在写抒情诗《泊船瓜洲》^[8]时,特别地注意遣词的效果,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先后改了多次,在“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绿”字非常传神地表达了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象,这首诗也成为朗朗上口的名诗。至于形象塑造方面,小说家施耐庵在创作《水浒》的时候,写出了人物的“同中之异”,比如鲁达、李逵和史进这些人都有粗鲁的特点,但是他们三人的粗鲁各不相同,鲁达的粗鲁是性急,李逵的粗鲁是蛮,史进的粗鲁是少年任气。施耐庵把人物塑造得符合“人情物理”,没有将英雄人物拔高或神化,认为他们既是理想中的英雄又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将英雄人物的行为写得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显得自然可信。比如他写武松打虎前的一些言行和心理活动,既写了他胆大,“怕什么,且只顾上去,看怎的”,也写了他看到官府文榜时有些胆怯的心理,这种矛盾的心理细致地刻画了武松的性格特征,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

文学创作活动是饱含着情感的活动,而情感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的特征,所以,作家必须以理性来驾驭情感,才能使创作成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工程。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阿·托尔斯泰说,在创作过程中,思想家(以理性统帅)和艺术家(以感性为统帅)应该同时行动,因为思想家“知道‘为了什么’,他要

知道目标,树立目标。艺术家富有情感,温柔得像女性,他的整个身心放在‘如何’做上,他按照路标前进,他需要框框,否则,他就到处乱走,无所适从。”^[9]换言之,文学创作中,作家要以理节情,把情与理统一起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以理节情也是有渊源的。在汉儒作品《毛诗序》中,“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古时诗歌所体现之情,是被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化的“情”。这可以称作是“以理节情”的先声^{[2]40}。清代文论家张道深在谈小说的虚构问题上也精辟地论述了“情理”关系,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他还特别欣赏《石头记》这种“事之所无,而理之所有”的“真正‘情理’之文”。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关系上,他主张二者统一的关键在于“人情物理”^{[2]249}。与张道深同一朝代的章学诚则强调“气”与“情”,“气”是作者观察历史事实的得失是非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意志,“情”则是作者在缅怀历史的盛衰与兴亡时所产生的低徊感叹之情,至于“气”与“情”的关系,他认为“气”要“合于理”,“情”要“本于性”,“贵于正”,反对作者只凭个人意气,感情用事,主张作者的思想倾向要符合理性与公平的原则^{[2]300}。张道深和章学诚的观点比较明晰地阐释了情与理在创作中的有机结合的关系。

(三)文学欣赏:知人论世

文学欣赏是指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借助形象思维活动,通过形象的感知、体验,获得艺术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性精神活动,欣赏者要具备一定的生活阅历与艺术修养才能从作品中发掘出潜在的审美价值。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进行自我创造的历史;文学艺术就是这一进程的感性显现。因此,欣赏者在接受文学艺术过程中,人们不仅感到自己从世界取得了自由创造的智慧、才能和力量,并且以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份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占有整个自然和社会,实现了自身的超越。这就是文学欣赏在接受者身上体现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意义。此外,文学欣赏还是一种形象思维活动,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把其中描绘的人物、事件与生活场景通过想象和联想综合起来,在脑海中形成生动的生活画面。在形象思维过程中,读者对文学作品也进行了二度创作的过程,欣赏者带着被艺术形象所唤起的激情和想象,结合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积累和审美经验,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和发现蕴涵于形象之中的深层内容。欣赏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就是文学作品价

值的实现过程,同时,欣赏者对作品的反馈也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创作。

在文学欣赏过程中,为了探求文学作品之审美价值和获得艺术上的享受,读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为了更好地欣赏文学作品,“知人论世”这一方法必不可少。中国古代文论中,孟子是“知人论世”观的创始人。前文提到孟子主张学习古人,不仅要读古人的诗、书,而且要知其人,论其世的“知人论世”观。当代学者丁文林阐释孟子的这一观点说“‘知人’是读书的目的,‘论世’是‘知人’的途径”^[10],因此,孟子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去了解古人,论其世,与古人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这一主张开创了文学欣赏的优良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说,“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0]

南北朝时期刘勰是孟子“知人论世”观的忠实实践者之一。他的《文心雕龙》全面地诠释了孟子这一观点。整部《文心雕龙》的创作过程就是他对作家、作品以及作家的时代进行深入了解的过程,他不仅对各作家的为人胸中有数,并且对他们的作品作出精到细致的评价。这部作品中,体现知人论世观的重点篇目在于《时序》、《才略》、《知音》和《程器》,这四篇分别涉及文学史、作家论、批评鉴赏论和作家品德论,其中以《才略》更为详细地体现孟子“知人论世”观。刘勰在该篇中写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在此他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曹丕和曹植,认为曹植作诗来得快,写得绚丽,曹丕思考周详而笔力迟缓,所以曹植可排在前面。但是曹丕作的乐府诗清新,《典论》辨析扼要,两人各有长短。他评论作家不光从他们的政治遭遇和身份地位出发,还结合了二曹各自的作品实际情况^[11]。

孟子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欣赏观,对各时代作家评价均有影响。如齐梁时期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就打破了前人对陶氏不甚重视的传统,认为陶诗极有艺术特色,“寄酒为迹”,托物喻志,其文辞精拔不群,音节“跌宕昭彰”,“抑扬爽朗”,其文明净高邈,净如“素波”,高若“青云”,其文意“语时事”,“论怀抱”,最后深赞陶氏安贫乐道,“贞志不休”。从陶渊明的《咏贫士》就可以体会到诗人安贫乐道的高尚品格——“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

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12]他咏赞战国时贫士黔娄不为齐国和鲁国的重利所诱惑而为官,一直隐居过着贫困的生活,死时衣不蔽体,他的安贫守道至死不渝的高尚操守让陶渊明深为敬佩。陶渊明也确实把安贫乐道作为他的座右铭。他仕途十三年的经历就是抱着“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过程,最后他赋上《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于是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三 中国古代文论伦理向度的现代启示

纵观中国古代文论,可见古代文人对伦理的重视,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关注,无论是孔子倡导的“仁”、“诗无邪”、“兴观群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尽善尽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文质彬彬”,还是孟子的“浩然之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还是“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等,从中反映的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表现的是对人的自身成长,对道德修养的完善的关注和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或者我们现代所倡导的人文关怀。这种重视伦理的文论观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传承和创新两个层面来讨论。

一方面是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的传承。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承袭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比如著名作家茅盾所力倡的文学工具论,就是体现了这一传统。他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说,近代文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的文学,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映,是大多数平民要求正义人道的呼声,是猛求真理的文学”^[13]。当然,茅盾的文学观到后来日本入侵中国,中国遭遇民族危机之时有了深入,他对史上各代的“文以载道”观有了批判,揭穿了封建“载道”文学为了宣扬古圣先哲的大道,为了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的本质,提倡文学要面向现实,反映劳苦大众的人生,促进社会的进步,把文学变成为推动社会、激励人心的积极力量。这在20世纪初到中期,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另一方面是创新。现代文学家鲁迅也是一位对文坛影响深远的作家。他早年怀着兴业救国的理想,到南京学采矿学海军,后来又怀着对维新的信仰去日本学医,最后弃医从文,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举起文学的大旗,倡导改变国民精神之弱点,从精神上拯救中华民族。他对国民性进行了针砭,认为国民

性的弱点在于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调和、折中、保守、麻木、容易做奴隶、捧与压(为了避免灾害而捧,捧火神、瘟神等,受了压迫之后转而压迫比自己更弱小的弱者)、缺乏敢为最先和“耻于最后”的精神、盲目自大、闭关自守、排斥异端的思想,重礼节面子,缺乏坚定的信念等,比如他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的故事,反映的是他抓住被封建社会毁掉的这些病态人物,用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14]。此外鲁迅还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彻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他对封建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做了深入骨髓的批判,尤其对以“孝”为中心的“三年无改与父道”的封建纲常伦理抨击猛烈。他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实质是对古代文论中倡导的封建纲常伦理的针砭,起到了倡导人们追求民主,向往自由(尤其是女性的婚姻自由,独立自主的人格等)的进步作用。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出发点,也就是试图找到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切合点,并尽力做到“古为今用”,对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创建作出应有的贡献。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精华。文学理论作为面向人类精神与灵魂的精神产品自然要面对当下的人文现实环境,要从关注当前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现状的角度,站在解决当代人精神困惑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去研究文学,从事批评,提出理论观点,融合古代文论。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会现实,提升人类灵魂的方面,古代文论相当有成就。孔子、孟子、庄子、刘勰、陈子昂、韩愈、白居易、李贽等人的文论思想,都是出于对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忧虑与关怀而提出来的,其针对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比如孔子的“礼乐”、“诗教”思想,包含着对塑造理想文明社会、培养理想文明的文化人格的一种价值导向。他提倡以“仁”为本,以“礼”为用,礼乐结合,共同实现“仁”的道德理想。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与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于作家自身修养的强调也深深影响后世。又比如荀子,在如何处理“欲”的问题上,他既不象道家那样提倡“少私寡欲”,也不象墨家那样提倡“非乐”的节欲,他肯定欲望的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主张对人的欲求加以引导,关键在于使人的思想达到“中理”即合理。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15]因此,社会的治乱问题不在于欲求的多少,而在于思想是否中理。只要做到“重己役物”,而不要“以己为物役”^[15],就可以“养乐”,正当地享受音乐。孔、孟、荀的上述思想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如今有少数文艺作品放弃崇高的理想追求,避讳言“道德”二字,有的还专打“擦边球”,在“黄”与“非黄”之间寻找刺激以求得作品的畅销,这与用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去培养一代新人的文化人格是背道而驰的。个别作家与演员追求金钱至上,见利忘义,也败坏了作为精神文明创造者的声誉。那么,在建设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过程中,我们难道可以对传统文论中那些强调艺术要有助于道德人格培养、有助于人的思想情操净化以及主张真善美结合的观点视而不见、弃而不用吗?

(二)传承古代文论中的自然之美,追求艺术创造的自然天成。古代文论崇尚自然之美,主张追求艺术创造的自然天成,反对矫情饰性与繁采寡情,这亦是值得我们当代文论认真去借鉴与运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为文造情、装腔作势、矫情饰性者不少,但我发现很少有批评家会运用古代文论中的“自然真美”理论去批评。按理来说,当代人追求生活节奏的明快,追求性格开放任性而行,为减轻精神压力会更亲近自然,也更能接受“自然真美”的理论。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却完全抛弃古典“天人合一”与自然天放的传统,追随西方走刻意求奇求新求怪的道路。批评家也惯于和乐于使用西方批评术语,用后现代主义的一套框架来规整这些作品,两者相互呼应,使文学创作越来越难以理解,也越来越失去意义。从关心当代人的精神与心理健康方面而言,当代文论应该融汇古代文论中“自然真美”理论,引导文学创作在有益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1] 曹连观. 文艺的德性:审美与伦理的耦合[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6(2): 123-128 + 151.
- [2] 李铎.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3] 乔山. 文艺伦理学初探[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34.
- [4] 闫琦. 韩昌黎文集注释(《答蔚迟生书》)[C].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 [5] 周敦颐. 周敦颐集(《通书·文辞第二十八》)[C]. 长

- 沙:岳麓书社,2002.
- [6] 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79.
- [7] 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9.
- [8] 姜葆夫,韦良成.常用古诗(王安石《泊船瓜洲》)[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 [9] 孙耀煜,郁沅,陆学明.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10] 丁文林.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论[J].商场现代化,2006(2):306.
- [11] 严小玲.孟子“知人论世”观对刘勰批评理论的影响[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54-56.
- [12] 卞孝萱,黄清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汉魏南北朝卷)[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3] 李荣启.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J].重庆社会科学 2007(7):48-51.
- [14] 戚德忠.鲁迅小说病态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4):35-37.
- [15]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Ethical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omments

DONG Zheng-yu, XIAO Ying-h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Comment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re works or articles on literary creation,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They reflect the thoughts, cultural ideology and life values of ancient writers. It has profound content and shows great concern about the ethical world of human being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ree ethical features of the comments: moral connotation in literature, emotion restricted by rationality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s by knowing ancient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ir times. The author also explains the impacts of the comments on modern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comment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in literature; emotion restricted by rationality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s by knowing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ir times; ethical perspective